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27

# 当代欧美创伤回忆录的发生研究<sup>①</sup>

师彦灵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创伤回忆录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发生是三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即20世纪80年代人文领域的创伤转向,边缘群体见证其被压迫、被忽视生存状态的政治需求以及个体治愈创伤的内在驱动力。对创伤回忆录发生的研究,可以完整地揭示创伤回忆录的写作动机、写作范式及其发生的理论基础,为创伤回忆录的整体研究和具体文本研究提供范式,很有意义。

**关键词:**创伤回忆录;发生;创伤转向;见证;治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152-08

## On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Trauma Memoirs

SHI Yan-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rauma memoirs which narrate and record the writers'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crises they are faced with have been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world since the 1980s, and have produced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ociety and life of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Their rise has resulted from the joining action of three forces, i. e. the traumatic turn in the 1980s,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political need for witnessing their being oppressed and neglected, and the individual's drive for healing his trauma. An exploration of the rise of trauma memoirs can demonstrate motives,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rauma memoirs, which sets up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trauma memoir texts. And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trauma memoirs; rise; traumatic turn; witnessing; healing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文学出现了大量以记录和描述作者的创伤经历或面临的危机为主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与传统的自传不同,它“关注的是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时刻”<sup>[1]118</sup>,以童年苦难、丧失亲人、犹太大屠杀、暴力、疾病、贫穷、吸毒等创伤事件为主要关切,这类回忆录被称为创伤回忆录。创伤回忆录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屡屡占据畅销书榜首,并摘得各类奖项,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甚至成为职业作家喜爱的文类。对此,雷·吉尔莫(Leigh Gilmore)认为是“创伤的时代与传记的时代发生了巧合”<sup>[2]16</sup>。

创伤回忆录的大量涌现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发了文学界、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伤回忆录的繁荣犹如现在无处不在的谈话类

① 收稿日期:2015-02-05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LZUJBWZY004)

作者简介:师彦灵(1966-),女,山西襄汾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疾病叙事及创伤理论研究。

节目,以窥探个人隐私为嗜好,说明现代出版业水平和价值水平的降低;另一部分学者对创伤回忆录的繁荣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回忆录作者们去除一直困扰他们噩梦的健康方式,这些困扰他们的真实经历既不是窥探他人隐私,也不会对读者的文学敏锐性造成不良影响。

无论人们持什么样的观点,创伤回忆录已经成为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现象,其影响力几乎渗透到我们所追踪的每一个话语领域,无论它是科学的或是文化的、专业的或是业余的、高雅的或是低俗的。回忆录存在的历史已久远,但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而创伤回忆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因此,探究其发生与繁荣的动因成为创伤回忆录研究的首要问题。

## 1 创伤转向: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文化语境

“创伤转向”是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人文领域学者对创伤研究的浓厚兴趣及创伤理论的繁荣。现代性是创伤产生的根源,“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性永远打断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传统’经验的统一结构”<sup>[3]238</sup>,“与帝国主义、消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20世纪人们的基本经验,如灾难性事件和全球的跨文化冲突”<sup>[4]24</sup>。尽管现代性早已让位于后现代和后殖民,或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说的“帝国”,但近几十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却将我们带回到战争、集权杀戮、现代化、帝国入侵和殖民征服对传统文化的毁灭造成的创伤,这些创伤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欧美批评理论一直受解构主义影响,将语言视为理论核心,忽视情感,批评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难以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创伤理论——重新将身体和情感引入理论范畴——似乎为批评家将高雅理论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提供了方法,为人们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搭建了一座桥梁。

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创伤研究经历了对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对战争创伤的研究及《摩西与一神教》中对文化创伤的研究三个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创伤的阐释。“他对创伤的类型、社会根源、心理症候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分析,为此后的创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sup>[5]</sup>然而,“创伤的心理学研究一直很少受到重视,每次都是在战争爆发后,当社会在解决战争幸存者心理问题方面遇到挑战时,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才会有所复苏。”<sup>[6]2</sup>20世纪70年代对越战退役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研究便开启了现代创伤心理学的研究,并促使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将PTSD正式列入其诊断手册。其后,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劳伯(Dori Laub)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教授主持,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卡鲁斯(Cathy Cruth)、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等积极参与的长达10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视频档案工程,通过录制的4400份犹太大屠杀证据,给长期默默忍受着创伤症状,却不曾受到关注,而今已步入老年的普通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发出了自己声音的机会,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层面的研究正式开启。创伤研究成为人文研究的新范式。

卡鲁斯和费尔曼最先转向创伤研究。他们首先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被详细记录在劳伯和费尔曼1992年合著的《见证的危机》一书中。这部著作与卡鲁斯的早期著作《无人认领的经历》(1986)及其主编的《探索创伤记忆》(1995)开启了人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心理创伤研究。此后,哈特曼(1994,1996)、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1994,1998)、罗森博格(Michael Rothberg,2000)对大屠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如此多的著名学者,出版了如此多的大屠杀研究成果,学界一时间对犹太大屠杀表现出极大兴趣。之前10余年在法国出版,但几乎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回忆录,如戴尔伯(Charlotte Delbo)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伤痛经历的回忆录以及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描述等待从集中营回来的丈夫的《痛苦》等,现在都被翻译成英语,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关注。克鲁格(Ruth Kluger)的《依然活着》(1994)等新的回忆录也逐渐成为创伤理论文本分析的基础。

创伤理论很快超越了大屠杀研究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儿童暴力事件被曝光。女权主义心理学家,如赫曼(Judith Herman)和布朗(Laura S. Brown),首先对PTSD定义中明显的男性偏见

提出了质疑,指出强暴、殴打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与家庭暴力是女性和儿童的普遍经历,给他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创伤。她们的质疑不仅源于他们治疗的很多遭受暴力的女性患者现在愿意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且源于女性患者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儿童时期遭受性暴力的症状。赫曼的《创伤与复原》(1992)是赫曼20年“对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做的研究与临床工作的成果”<sup>[7]10</sup>,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描述了受创者——尤其是遭遇性侵害和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儿童——所表现出的创伤症候,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阶段:“建立安全感、重建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sup>[7]11</sup>。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快成为畅销书,并在1997年再版。而布朗批评1984年PTSD诊断定义存在性别偏见的那篇文章在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sup>[3]100-112</sup>,同时在心理学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针对儿童性暴力的记忆复原(recovered memories)。儿童和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受到鼓舞的女性和童年遭受过虐待和贫穷的人们终于敢于将自己一直隐秘在心的伤痛讲述出来,并希望因此而治愈自己的创伤,苦难回忆录(misery memoirs)和女性创伤回忆录一时出现繁荣。

“‘苦难回忆录’是英国《书商》杂志创造的一个术语,描述自1995年佩尔泽(Dave Pelzer)的《被称作‘它’的孩子》和1996年麦考特(Frank McCourt)的《安杰拉的骨灰》以来出版界的一种现象。”<sup>[8]115</sup>很多“苦难回忆录”都遵循一个模式,即记录作者如何战胜童年遭受的虐待、贫穷和失去的悲惨经历。《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及其续篇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用真实而略显笨拙的语言讲述了佩尔泽童年遭受母亲虐待的经历;《安杰拉的骨灰》讲述了麦考特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艾格思(Dave Eggers)的《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2001)则记录了艾格思因父母患癌症相继去世,他不得不承担起弟弟父亲的角色而承受的痛苦。

女性创伤回忆录则以遭受暴力侵害和失去亲人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为中心主题。失去亲人的回忆录是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回忆录的发展方向。米勒(Nancy K. Miller)在《公共话语,私人生活》一文中曾经预言:以失去父母(亲人)为中心的女性回忆录在21世纪将成为主流。她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批女性作家已经崛起,向世界呈现她们悲痛的故事。英国作家莫里森(Blake Morrison)的《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1993)书写了她对父母死亡的思考;柯尔(Susan Letzler Cole)的《思念爱丽丝》(1998)、贺希(Marianne Hirsh)的《家族结构》(1997)、赫曼(Anne Hermann)的《来自另一世界的信》(1998)等讲述了失去母亲的伤痛;而卡普兰(Alice Kaplan)的《法语课》则描述了死去的父亲对她的困扰。

然而,女性创伤回忆录描写较多的是乱伦和性侵,这类回忆录的作者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治愈暴力侵害的创伤。因为这类创伤事件突发性、隐秘性的特点,受害者总是生活在幻觉和噩梦之中,叙事缺乏连贯性,呈现出叙述者情感断裂和人格分裂的特征。弗雷泽(Sylvia Fraser)幼时遭受父亲的性侵害,这一乱伦创伤一直影响着她成年之后的生活,甚至婚姻,因为她时常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一次在观看电视采访时,看到一位朋友讲述曾经受到父亲的性侵,她才意识到父亲曾经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她决定写作回忆录《我父亲的房子》(1989),将曾经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一切讲述出来,以治愈自己的创伤。回忆录中不断出现闪回和意识断裂,身份分裂成为她生活的特征。然而,通过写作,一个新的自我正在慢慢诞生,她逐渐从创伤中走了出来。西伯德(Alice Sebold)虽然被警察认为很“运气”,因为之前有位姑娘在她被强奸的同一地点被强奸后杀害,但她的《运气》(1999)呈现的是暴力强奸对她的持久影响。大学一年级时,西伯德在大学生校外被强奸,这一创伤经历对她之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后的15年,她时刻被恐惧、害怕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难以建构自我身份,走出创伤。

神经科学家柯尔克(Bessel van de Kolk)等通过科学的工具解释了创伤对大脑运行机制的影响,指出创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它影响的不仅是意义的生成,而且会造成正常情感的断裂,引发恐惧、害怕、震惊等情绪。在创伤期间,大脑只有感觉区——大脑扁桃体——处于活跃状态,而生成意义部分——理性思维、认知过程——的大脑皮层已然关闭,因为创伤的影响太大,在大脑认知系统中无法记录。贾内和弗洛伊德捕捉到了这一本能过程,但是因为缺乏后现代的工具而无法进行证明。卡鲁斯等心理分析学家接受了这些理论,认为正因为创伤经历尚无被赋予意义,因此,创伤事件会通过梦境、闪回

(flashback)和幻觉等困扰着创伤主体。

无论是犹太大屠杀回忆录,还是苦难回忆录和女性创伤回忆录,创伤记忆及创伤造成的情感断裂都是他们描述的主要内容,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创伤理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作为创伤理论阐释的文本基础,以其独特的形式见证着受创者的痛苦经历。创伤回忆录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直接原因是创伤转向创造的文化语境,同时,创伤回忆录的发生和繁荣也离不开其重要的政治语境。

## 2 见证: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政治语境

长久以来,白人男性是自传和回忆录创作的主体和被评论的主角,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严重病患者及残障人士等边缘群体一直被排除在自我叙述行为之外,他们的声音一直被压抑。20世纪70、8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支持后殖民、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同性恋以及疾病书写,为回忆录写作创造了“颠覆和修正的可能”<sup>[9]595</sup>,为回忆录写作主体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语境。妇女、少数族裔、严重病患者等被排斥、压抑、剥削和遭受暴力的弱势群体,以“记录我们的不满”<sup>[10]99</sup>的回忆录形式见证了他们的伤痛,向社会发出不满和愤怒的呼声。“就美国而言,30年的政治造成了女性、黑人、同性恋见证的井喷,之后酗酒、家庭暴力、性混乱、儿童夭折引起了政治阐释的关注。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要讲,有灾难要叙述,有回忆录要写。”<sup>[11]</sup>正如吉尔莫所说,“如果没有近30年来社会政治运动使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出版讲述自己经历的著作的话,时下回忆录的繁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残疾人以及暴力受害者都通过阐述受压迫者的经历,创造新的关注,为自我再现的不断拓展做出了贡献”<sup>[2]16</sup>。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创伤回忆录作为见证的工具见证了这个时代,影响着这个时代,“成为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联系的重要模式”<sup>[12]5</sup>,成为边缘群体反抗压迫,争取公民身份、国家身份的政治武器。

见证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艾滋病回忆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英美,艾滋病回忆录大约始于1986年,这些回忆录以第一人称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病情,尽管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叙述形式或叙述缺乏一致性,但是可以记录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新的治疗方式不断变化、甚至死亡的现实情况,将西方国家想要作为个人隐私隔离的东西公开化。艾滋病主要是由政府 and 大众媒体控制的全球性复杂疾病,通过展示那些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少数群体的死亡规劝人们性的“纯洁”,这些少数群体包括男同性恋者、使用静脉注射吸毒者、无知或迷信的非洲人<sup>[13]102-103</sup>。在西方,艾滋病主要与男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艾滋病回忆录是“文化领域违反文化期待的一种文类异常现象”<sup>[14]5</sup>,它“处于文化边缘,从文化边缘的角度来讲话”<sup>[14]33</sup>,见证着钱伯斯所描述的“余波(aftermath)社会”文化对“集体创伤事件的否认”<sup>[14]xsi</sup>。在《借来的时间》(1988)、《致没有拯救我生命的朋友》(1990)及《这片黑暗的荒野》(1996)这样一部部艾滋病回忆录中,像蒙尼蒂(Paul Monette)、吉贝尔(Herve Guibert)及布落基(Harold Brodkey)这样的一个个艾滋病患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当代文化对男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偏见和冷漠,政府在艾滋病研究经费上的不作为;艾滋病患者也在回忆录的写作和自己的死亡中获得了权威:“死亡造成的影响被保存了下来;生存下来的原因被记录下来,甚至死后的行为模式被描述出来。”<sup>[14]5</sup>艾滋病回忆录通过见证,公开了艾滋病造成的创伤及其不可治愈的压力,鞭策读者面对未来、采取行动,直至其在医学上和政治上得到解决。

艾滋病回忆录驱动了20世纪90年代初疾病回忆录的大量涌现,并成为这一潮流中的一部分。疾病回忆录是近三四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回忆录形式,考泽(G. Thomas Couser)指出:“大肆宣传的‘回忆录的繁荣’也是残疾传记写作的繁荣,尽管出版商和书评家很少承认这一点。”<sup>[15]2</sup>疾病回忆录实际上是一种“病志”,是患者本人对其病情所做的自传性叙述,或其伴侣、子女或照顾病人的人以第三人称书写的回忆录。“病志”这一文体最早源于癌症回忆录,早期受到学界的关注是因为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隐喻》(1978)和罗德(Audre Lorde)的《癌症日记》(1980)。疾病回忆录涉及的疾病类型很多,如艾滋病、抑郁症、多发性肝硬化、自闭症及一些罕见疾病,已成经典的疾病回忆录如斯泰伦(William Styron)描述其抑郁症的《看得见的黑暗:一部疯癫回忆录》(1990)、鲍比(Jean-Dominique Bauby)

的闭锁综合症回忆录《蝴蝶与潜水钟》(1997)及纳齐尔(Karman Nazer)的《自闭症者的故事》(2007)等。

疾病回忆录的兴起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医疗技术主宰医疗行业的非人性化治疗方法有关,各种医疗器械的成倍增长,造成了很多错误治疗或不恰当治疗,疾病回忆录中有很大一部分对这种现象进行指控,疾病回忆录作者以个体的切身经历见证了个体作为病人所经历的人格丧失和无声状态<sup>[16]11</sup>,呼吁修改法律、修正医疗条款,提倡更为科学的治愈疾病的方法。同时,他们对人们的偏见提出抗议,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和看待病人和残疾人。而一些通过被正统科学摒弃的治疗方法幸存下来的幸存者的回忆录给患有同样疾病的读者以建议,提供治愈该疾病的有效的方法、安慰、支持或自助的生活经验和教训。《百忧解日记》(1998)讲述了作者斯拉特(Lauren Slater)26岁患有抑郁症后近10年的治疗过程和用药经历,揭示了医疗制度对病人的压迫及对病人正常需求的漠视,从“病人的角度”描述抗抑郁症新药百忧解(prozac)的作用以及医学、科学、大众等外部力量与病人内在感受之间的冲突。这部回忆录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如多种叙述层次、文本材料的并置,丰富的隐喻,具体的细节,“官方”文献的整合等,揭示了作者的多重心理层面:她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个体,而不只是一个像主流话语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只有一个层面。通过这部回忆录,作者见证了医疗制度对精神病人的压迫所造成的病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以及病人对抗医疗制度,建构自身主体性和自我身份的努力。

如果说《百忧解日记》见证的是医疗制度对普通患者的压迫和漠视,那么《一张脸的自传》则见证了白人女性美国梦难以实现的文化困境。格里利(Lucy Grealy)患了颌骨癌,手术后面部出现畸形,其自传主要讲述了面部畸形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和挫折。格里利认为,美国社会以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认为美是女性身份和价值的标志。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自己“丑陋”的面容,不仅使其失去了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女性的身份;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希望之地”,她不仅在寻找个人幸福中屡遭挫折,而且经历数不尽的歧视;美国并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她必须走“出去”。在自传的最后,当格里利坐在欧洲(可能是柏林,也可能是苏格兰)的一个咖啡馆里,与一位她刚碰到的男性交谈时,“手掌感受着杯子的温暖”,她似乎“可以看清自己”<sup>[17]222-223</sup>,在美国之外,她找到了家的感觉。

斯拉特和格里利以白人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疾病和残疾给女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而《女勇士》以少数族裔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美国神话的虚伪。汤亭亭是美国华裔作家,其回忆录《女勇士》(1977)通过汤亭亭在旧金山的成长经历,见证了美国大熔炉神话主导和代言的移民女性美国化的另类故事。作为华裔移民的女儿,汤亭亭既感到自己是美国的旁观者,又感到与父母所坚守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这就是亚裔美国女性与两种文化关系协商中的状况:试图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但最终或许无法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通过一个美国华人家庭的艰难融合以及两种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女勇士》拷问着“美国的”价值,用贝兰特(Lauren Berlant)的话说,就是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的“国家承诺(national promise)”和美国梦神话的承诺<sup>[18]10-15</sup>。汤亭亭的经历说明,美国国家认同的价值与汤亭亭这位讲述者/见证人的实际经验和感知是相违背的,因此,《女勇士》就是要向国内外的读者发出伦理呼唤,要他们清楚民族共同体倡导的价值与实际行为并不一致。通过呈现对美国民主的“国家承诺”的严重不满,《女勇士》成为“受压迫者的文本”,在此,汤亭亭实现了为自己和她所属的身份群体发声的政治和伦理目的。可见,“自传既是见证压迫的一种方式,也是通过群体的文化铭刻和认同赋予主体力量的一种方式”<sup>[19]97</sup>,它既“激励作者所属共同体的人们,同时教导无知者了解社会的真实”<sup>[20]37</sup>。

遭遇疾病、种族、文化、心理逆境的幸存者通过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切故事,重构了一个个被排挤到霸权结构边缘的破碎的自我。回忆录写作本身就是这个破碎自我的证词,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永远无法脱离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承担着抵抗社会文化中不公正、不健康蔓延的伦理责任。创伤回忆录的故事讲述者以自己所见证的一切影响着他人,影响着这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疾病的治疗者。

### 3 治疗: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功能语境

回忆录写作的治疗与复原功能是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时代曾遭

受同父异母哥哥乔治·达科沃斯的性侵犯,这一“创伤余悸”对其影响深远<sup>[21]14</sup>。迪沙佛(Louise deSalvo)通过对伍尔夫自传的研究指出,伍尔夫的全部自传都是由这一事件决定的,她的自传听起来像是一部自助教科书,然而“像很多其他女性的自传一样,也是一部描写战胜各种困难获得生存和成功经历的自传”<sup>[22]13</sup>。亨克(Suzette. A. Henke)在对女作家回忆录的研究中也指出,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反复重写的自传与她童年时代和战争带给她的创伤有关(如兄弟的死亡,丈夫因为战争精神失常等事件),通过一次次的重写,她的自传“将一个破碎的自我逐渐塑造为一个能够抵御各种创伤的前后一致的主体”<sup>[23]xix</sup>。伍尔夫与杜丽特尔的例子似乎从个体受创者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写回忆录”的问题:治疗创伤。

“创伤是对不可承受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经历,经历此事件的人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事后的,无法控制地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方式重复着。”<sup>[24]11</sup>换句话说,“创伤事件在发生之时未能被充分理解或体验,但是在事后,该事件却反复纠缠事件的经历者。准确地说,遭受精神创伤就是被一个形象(image)或一个事件所控制”<sup>[24]4-5</sup>。尽管创伤记忆挥之不去,但却是“沉默而不变化的”<sup>[25]175</sup>;它“不会像成人的普通记忆一样以语言和线性的叙事方式被编码”<sup>[25]37</sup>,而是会像婴儿的记忆一样以“强烈而栩栩如生的感觉和视觉图像”铭刻在大脑中<sup>[25]38</sup>。根据病理学的解释,创伤记忆构成了一种前叙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只是保持原有的模式,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以图像和视觉的形式不断重复地侵入受创者的意识之中,这种闪回有时每天会出现几百甚至几千次,反复困扰受创者的意识,直到最后变成一种执念。

卡鲁斯认为,创伤经历造成的后果是“大脑对时间的经验发生了断裂”<sup>[24]61</sup>,经验的断裂严重地扰乱了个体的心理、阻碍了个体的记忆、损坏了其用语言表达事件的能力、使个体的自我产生分裂,进而导致主体的情感和记忆成为碎片。创伤造成的这种碎片“破坏了以完整的方式正常运行的复杂的自我保护系统”<sup>[3]34</sup>，“打碎了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的建构”，“将受害者置于生存危机之中”<sup>[3]51</sup>，使其像地球引力一下子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一样，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原来的自我，失去了身份。

为了打破这种折磨人的重复循环,将受创者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受创者必须将创伤经历引向意识层面,从而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演和重新解释,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生命的意义。赫曼认为,创伤复原过程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建立安全感、重构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sup>[7]11</sup>。而写作,尤其是自传/回忆录写作是受创者重构创伤故事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最为安全的方式之一。斯塔罗宾斯基也指出,“一个人只有在生命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足够的动机来写自传”<sup>[26]78</sup>，“危机是自传的种子”<sup>[27]4</sup>，自传源于生活中的变化或断裂,成为对生活的反思,处于人生经历中连续与断裂的张力之中。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基本前提是谈话治疗,即通过交谈将压抑的记忆引导到意识表层,通过语言和想象宣泄情绪,但前提是需要一位具有耐心、同情心并认同讲述者的倾听者。回忆录写作过程犹如谈话过程,也是一个讲述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面对的是一位想象中的、富有同情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耐心倾听其讲述并认同其故事的倾听者。回忆录作者没有顾忌,可以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这种讲述过程比谈话方式的讲述给创伤故事讲述者更多的安全感,使其更自在和舒适。因此,回忆录写作是个体情感宣泄的最安全的方式之一。

对于受创者来说,有了安全的情感宣泄的环境,要想走出创伤,还需要将无意识创伤经历即“把故事,包括故事中的图像,转换成语言”<sup>[3]177</sup>,并对历史事实和情感反应进行重演。创伤回忆录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就是将一直困扰作者而作者几乎无法言说的、延迟的情感危机清楚地表达出来。创伤回忆录写作为受创者提供了安全自在的环境,在此环境之中,无法言说的伤痛至少可以写出来——在虚构的掩饰下或在重述这一保护性空间中,重述将作者/叙述者与自传作者塑造的主人公/人物区分开来,将其与她所想象的无名读者/听者区分开来。作为证词的回忆录可以使作者通过话语媒介分享那些痛苦的、违反道德的或受伤害的故事,而这种利用话语媒介的讲述可以针对任何人,或不针对任何人——针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个人证词看作是准确的历史见证或稍加掩饰的小说。不论哪种情况,“都是通过对心理创伤的重演,创伤叙事实现了情感的宣泄”<sup>[24]xix</sup>。因此,亨克指出,“被压抑的创伤和

心理碎片的一个重要模式常常毫无预料地大量出现在20世纪的女权主义自传中”<sup>[24]xii</sup>。当然,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男性作者的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通过人物的身体、感官、心理和情感细节生动而真实地重演了创伤事件及受创人物的恐惧反应。弗雷泽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房子》多处重演了其身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身份错乱”表征,真实地呈现了主体破碎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自传文本中,叙述者既是分析师,也是在无意中表露自己情感话语时接受精神分析的人。

呈现主体破碎的记忆、心理和情感的过程,就是主体将与创伤相关的思想和感受记录下来的过程,社会心理学家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认为,这一过程“迫使个体将极为复杂的事件的很多方面统整起来。一旦复杂的经历被提炼,可以理解,个体就可以超越创伤”<sup>[28]193</sup>。弗雷德(Jennifer Freyd)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个体“通过交谈或书写自己的创伤记忆,自然而然地形成对先前断裂的感觉和情感记忆的情节阐释和整合”<sup>[29]170</sup>。回忆录的见证“不仅仅是对私生活的见证,而且是文本与生活的结合,是一种文本见证,它可以像现实生活一样穿透我们”<sup>[12]4</sup>。如前所述,弗雷泽在书写其被压抑的乱伦创伤、宣泄真实情感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证词——她的回忆录,最终将心理碎片即拉康所说的破碎的想象主体清晰地表达出来,恢复了破碎自我在心理的主体地位,使之重新成为其生命戏剧中的主角,重新获得了自由。回忆录作为个体创伤的证词,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治愈仪式”<sup>[25]181</sup>，“使受创者处于英雄的位置——因为他是无法言说的真相的承载着”<sup>[30]</sup>。弗雷泽的回忆录不仅是其成为一名女作家经历的历史见证者,也是治疗其童年创伤的一种有效策略。

弗雷泽不是回忆录治疗功能的特例,很多回忆录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回忆录写作的治疗功能。新西兰作家珍妮特·弗雷姆(Janet Frame)在接受艾黎(Elizabeth Alley)的采访时说:正是大萧条时期的极度贫穷导致的“失去”(loss)感激发了她的《自传》写作<sup>[31]44</sup>。非裔美国作家罗德(Audre Lorde)声称,《扎米》(1982)是她在患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手术之前对书写治疗进行的一次实验。不难看出,创伤经历对于受创者主体性的建构影响深远,很多经历过强奸、乱伦、性侵害、意外怀孕、意外流产等不幸事件的女性和经历过极度贫穷、严重疾病、残疾等身心创伤的男性都本能地转向自传写作,通过将个人的证词公开化使创伤治愈成为可能,这就是写作创伤回忆录的内在驱动力。

#### 4 结语

文化的创伤转向、见证的政治需求及治愈创伤的内在驱动力三者合力引发了创伤回忆录的发生、发展和繁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批评理论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变得越来越抽象,难以应对和解决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耶鲁大学人文学者对犹太大屠杀心理层面的研究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范例,人文研究转而关注各类创伤现象,为这些现象提供理论阐释,为创伤回忆录的发生提供了合宜的文化语境和理论支持。创伤回忆录作为真实记录和再现创伤经历的一种文类,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严重疾病患者等提供了见证其受压迫和被忽视的生存状态,这一政治目的是创伤回忆录发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同时,创伤回忆录作者在遭受创伤之后本能地转向回忆录写作行为本身与其宣泄情绪、重整自我、重构被剥夺的自我身份并最终治愈创伤的内在动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文化、政治和功能语境揭示了创伤回忆录的写作动机、写作范式及其发生的理论基础,为创伤回忆录的整体研究和具体文本研究提供范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Luckhurst, Roger. *The Trauma Ques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2] Gilmore, Leigh. *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Trauma and Testimony*[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Kaplan, Ann E.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陶家俊. 创伤[J]. 外国文学, 2011(4): 117 - 125.
- [6] Barrett, Deidre. *Trauma and Dream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 朱蒂斯·赫曼. 创伤与复原[M]. 杨大和, 译. 台北: 中国时代出版公司, 1995.
- [8] Anderson, Linda. *Autobiography 2<sup>nd</sup>*[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9] Jolly, Margaretta.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2 vols*[M].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2001; II: 595 - 597.
- [10] Woolf, Virginia. "The Evening Party" in *The Complete Shorter Fiction of Virginia Woolf*[M]. Ed. Susan Dick. New York: Harcourt, 1989.
- [11] Gornick, Vivian. Why Memoir Now? [J].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1996, 13(10 - 11): 5.
- [12] Felman, Shoshana and Laub, Dori.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3]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14] Chambers, Ross. *Untimely Interventions: AIDS Writing, Testimony, and the Rhetoric of Haunting*[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
- [15] Couser G, Thomas. *Signifying Bodies: 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Writing*[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 [16] Hawkins, Anne Hunsaker. *Reconstructing Illness: Studies in Pathography*[M].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7] Grealy, Lucy. *Autobiography of a Fac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4.
- [18] Berlant, Lauren.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9] Anderson, Linda. *Autobiography 2<sup>nd</sup>*[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20] Wong, Cynthia Sau - Ling.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 Casebook*[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1] Benstock, Shari. *The Private Sel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M]. London: Routledge, 1988.
- [22] deSalvo, Louise. *Virginia Woolf: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on Her Life and Work*[M].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9.
- [23] Henke, Susan A. *Shattered Subjects: Trauma and Testimony in Women's Life Writing*[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 [24]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5]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 [26] Starobinski, Jean. "The Style of Autobiography" in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M]. James Oln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7] Egan, Susanna. *Mirror Talk: Genres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utobiography*[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 [28] Pennebaker, James. *Opening Up: The Healing Power of Confiding in Others*[M]. New York: Avon, 1992.
- [29] Freyd, Jennifer. *Betrayal Trauma: The Logic of Forgetting Childhood Abus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0] Haaken, Janice. The Recovery of Memory, Fantasy, and Desire: Feminist Approaches to Sexual Abuse and Psychic Trauma[J]. *Signs*, 1996, 21(4): 1069 - 1094.
- [31] Alley, Elizabeth and Williams, Mark. *In the Same Room: Conversations with New Zealand Writers*[M].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2.